

中華上下五千年

中華名著

傳承千載文明
開闢中華未來

卷四



京華出版社

中华名著

吴樵子 主编

中华上下五千年

卷四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上下五千年/吴樵子主编. -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3

ISBN 7-80600-174-3

I. 中… II. 吴… III. 中国-古代史-史籍
IV. C9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462 号

中华上下五千年

主 编□吴樵子

责任编辑□方 木

封面设计□百川空间

出 版□京华出版社(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010)64258473 64258472

发 行□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北京万博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1200 千字

印 张□50

印 数□5000

出版日期□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06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00-174-3/I·40

定 价□298.00 元(全四卷)

京华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三十五、弘治之中兴

弘治是明代第九个皇帝孝宗朱祐樞的年号，弘治元年(1488年)至十八年(1505年)在位，共计十八年。在他统治期间君明臣良，政治比较清明，是明代除洪武、永乐外，同仁、宣同为史家称道。

朱祐樞是明宪宗的第三子。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淑妃纪氏所生。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18岁的太子朱祐樞正式继皇帝位，史称明孝宗，定明年为弘治元年。从此，便开始了为时18年的弘治统治。

明孝宗登极后，颇有点兴利除弊的劲头。首先，他排除了旁门左道对朝廷的干扰和诱惑。把首恶、官居侍郎的李孜省逮捕入狱；将其父在位时养在宫中的众多僧道和江湖术士，先革去赐给他们的法王、佛子、国师、真人等各种封号，跟后分别予以驱逐，罪恶深重者给以惩处。接着，又将招引这些僧道的内监梁芳、韦兴和外戚万喜、万通、万达等投入狱中，等候查处。同时，他又斥逐了贪婪无耻、惑乱朝廷达20年的内阁首辅万安。为了整饬朝纲，他起用名臣王恕任吏部尚书，擢丘浚为礼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转而兼任兵部尚书。在内阁，先后引用了徐溥、刘健、丘浚等为首辅。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三人组成的内阁，更是无比精悍。李东阳极善策划，刘健机敏果断，谢迁长于阐述，时谚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三者相互配合，最为得力。孝宗皇帝在他们辅佐下，既纠正了宪宗时的弊政过失，又宽恕了万贵妃的罪行，政局很快就得到了稳定。他任贤能，退不肖。勤于政务，几次召集阁臣等到文华殿共议庶政，时常亲自批阅奏章，决断政事。此间，他采纳了马文升条陈的时政十五事，停撰道教的《三清乐章》，禁绝外戚张延龄等的广占民田，停止了江南织造衙门；又命白昂等精简刑律；招纳御史王景议，罢免立皇庄等等。因此，《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评论称赞他“恭俭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在他统治的前中期明朝出现了盛世局面。只可惜，到其后期，因体弱志衰，加之幼年在祖母周太后身边时，深受佛老思想影响，一度轻信了太监李广的诱惑，转信佛道符箓等，进而使李广得以肆无忌惮，大开委授传奉官之禁，多方索贿，强占畿内大量民田，乃至侵牟国家专有的官盐之利。幸亏在刘健等人的谏诤之下，迅速改正过来。特别是当李广畏罪自杀后，在其家抄出的怪书上，记有文武朝官送给李广大量的“白米”和“黄米”，孝宗原不理解，经左右解释，方知是白银和黄金的代称，大为震怒，不仅迅速处死了李广，并且下令按名册把那些送礼的大臣，逐个进行了究治。只有张延龄弟兄霸占民田一事，因有皇后的说情，没有追究。

三十六、朱寘鐫叛乱

朱寘鐫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庆靖王的后代。他祖父朱秩终，是庆靖王第四子。

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被封为安化王。

弘治五年(1492年),朱寔鐸承袭安化王的王位。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太监刘瑾把持国家权力,实行特务统治,使全国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朱寔鐸生来性格狂妄,素有野心,并且相信怪诞、妄说。当地的术士、相面人投其所好,乘机吹捧他日后一定大富大贵。

有一个名叫王九儿的巫覡,教给鸚鵡推算祸福的言语,他每次见朱寔鐸的时候,教鸚鵡称朱为“老天子”,使朱寔鐸愈发相信他有做皇帝的天命,这促使他图谋反叛的野心。又因为当时朝廷在刘瑾把持下,政治昏暗,宁夏指挥周昂、千户何锦、丁广以及当地的士人孙景文、孟彬、史连等也希望朱寔鐸取得更大权力,乘机借他晋升或做官,他们为此与朱寔鐸往来很密切。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以明武宗的名义派大理寺少卿周东到宁夏地区丈量土地,加倍征税按亩敛取钱财,为了勒逼税收,周东对屯田兵将实行鞭打酷刑,造成了屯戍官兵对朝廷的怨恨。四月初五日,朱寔鐸决定起义反叛。

由孙景文草拟檄文,并向各边镇驻军发出檄文,宣布了太监刘瑾把持朝政,文臣武将都投靠刘瑾,倚为心腹,内外勾结,共谋取代明武宗的不轨行为,并声明他们的叛变是为了清除刘瑾势力、保卫朝廷等“清君侧”的目的,还号召边疆驻军响应。朱寔鐸任命何锦为讨贼大将军,周昂、丁广分别为左、右副将军,孙景文为军师,徐钦为先锋将军,魏镇等七人为都护,朱霞等11人为总管,在庆阳起兵,关中地区为之震动。

北京的明朝廷得知朱寔鐸起事的消息,以神英为总兵官,仇钺为副总兵官,令他们率兵征讨朱寔鐸。

仇钺假降在安化城中作为明官军内应,仇钺擒住了朱寔鐸和他的儿子朱台濬,仪宾谢廷槐、韩廷璋及党羽李蕃、张会通等。

随同朱寔鐸叛变、起事的将领何锦、丁广、张钦、杨泰、王辅等在混战中脱身逃走,仇钺派兵追到贺兰山北,全部抓获,还抓住附合叛变的申居敬等人。朱寔鐸的叛变,历经了18天就宣告失败了。

三十七、朱宸濠之叛

朱宸濠是宁王朱权的玄孙,弘治十年(1497年)袭爵。正德初年,朱宸濠见武宗昏庸无能、荒淫误国,便萌生了取而代之的野心。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朱宸濠用两万两金银收买了掌权的大宦官刘瑾,得以将南昌左卫改为宁王府护卫,并取得了在南昌设河泊所,收取来往捐税的特权。谁知好景不长,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刘瑾事发,被处死。朝廷下令仍将宁王护卫改为南昌左卫。朱宸濠心中十分不满,加紧勾结宦官和权贵,以及地方官员,企图推翻朝廷。

正德九年他自称闰王,改护卫为侍卫,改令旨为圣旨。六月,密令刘吉等招募大盗杨清、李甫、王儒等百余人入府,称为“把势”。收买鄱阳湖大盗杨子乔等人,纵容他们劫掠商民。八月,他还无理要求巡抚以下的地方官穿戴朝服参见,遭到巡抚俞谏的拒绝。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公开造反。他下令捕杀了江西巡抚孙燧、按察司副使许逵。囚禁了御史王金、主事马思聪、金山、右布政使胡濂、都指挥使许清、白昂,太监王宏等一大批地方官员。

· 史 ·

七月初一日,朱宸濠发布檄文,历数武宗荒淫昏暴之事,声言替天行道。率领六万大军,号称十万,出鄱阳湖,顺江而下攻占南京。浙江镇守太监毕贞准备起兵响应。初七日,叛军进攻安庆。知府张文锦等死守孤城,迫使宁王驻扎在了于坚城之下,失去了战机。

这时王守仁也在江西积极组织府县的兵力,准备平叛。七月十八日,各府县兵马在丰城会合,王守仁决心直接进攻南昌,以断朱宸濠的后路。十九日,王守仁率兵出发,一鼓作气于二十日攻占南昌。

二十二日,王守仁否定了固守待援的主张,拿出大批粮食赈济城中军民,赦免参与叛乱的胁从者和投诚者,稳定了民心和军心。然后,亲自督师迎击叛军。二十四日,两军激战于黄家渡,叛军败退。次日,再战于黄石矶,叛军死伤惨重。最后,二十五日,官军在樵舍击溃叛军主力,俘虏了朱宸濠以下所有叛乱首领,乘胜收复了九江、南康等地。

王守仁平叛的捷报和擒捉叛王朱宸濠未传到京师,明武宗下诏亲征并启程,刚到良乡。九月到达南京。当听说王守仁押解朱宸濠来南京的消息后,江彬等竟主张释放朱宸濠,让他到鄱阳湖召集旧部,由明武宗亲率大军与他展开决战,以显示明武宗的天威。同时,他们在明武宗耳边大讲王守仁的坏话。王守仁只好连夜抄小路将朱宸濠送到杭州,交给太监张永,经张永为王守仁讲情辨诬,才打消了明武宗对他的猜忌。任命王守仁为江西巡抚。同时,明武宗下令张忠、许泰、刘晖等率领京军、边军讨伐朱宸濠余党。张忠等趁机纵兵劫掠百姓,大发横财。次年九月,武宗要求王守仁重写捷报,加入江彬、张忠等人的“功劳”。十月,明武宗班师回到北京,十二月,处死朱宸濠及其余党,但政治上仍旧继续腐败下去。

三十八、大同兵哗变

大同是明代的边关重镇。嘉靖年间,这里就不断遭到元军侵扰。为了巩固边防,巡抚、都御史张文锦决定在城北九十里处建立“五堡”,作为抵御外族入侵的前沿堡垒。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五堡”即将建成,并计划迁徙戍卒 2500 家开赴那里镇守,平均每堡驻扎 500 家。消息传开,戍边军士议论纷纷。他们觉得,居住在距城 20 里处尚且不断遭到异族侵扰而无宁日,现在要到距城近百里的“五堡”居住,一是有敌入侵,谁来相救?于是表示宁死不愿迁徙。张文锦知道后,严令不得抗命。他派参将贾鉴对拒不迁徙者严刑处罚。此举终于边卒的兵变。

哗变军士的头目主要有郭鉴、杨忠等人。他们杀死了贾鉴,处死了张文锦,还裂其尸首以泄愤。前总兵朱振被叛卒挟持出头作主,朱振提出三点要求:一勿犯宗室、二勿掠仓库、三勿纵火杀人,如果叛兵答应,便出头主事调解,否则宁死不从。叛兵答应愿意从命。

八月,朝廷决定由按察使蔡天佑继任巡抚,都督桂勇为总兵官,另派太监武忠镇守,同时派遣兵部侍郎李昆前往宣布赦免旨令。蔡天佑来到大同后,会同武忠、桂勇等召集叛乱军卒宣谕朝廷旨意,才使局面稍有缓解,但是仍然不时有士卒抢劫事件发生。总兵官桂勇处死了五十余人,其余均被赦免。

十一月,户部侍郎胡瓚、都督鲁纲率军征讨大同叛卒,称“诛首恶,胁从不问”。总兵

· 史 ·

五七七

官桂勇设计抓住首犯郭鉴、杨忠等十一人，全部斩首示众。郭鉴的父亲郭疤子纠集胡雄、徐毡儿等人再次聚众作乱，围住桂勇的家宅，抓住桂勇，杀死桂家数人。第二年二月，郭疤子纠集同伙数十人潜入城中，乘夜晚焚烧民宅。待天亮之后，蔡天佑擒住郭疤子等四十余人，全部处死。此次兵变终于被平息下去。

嘉靖十二年(1533年)，兵部商议在大同设总制重臣，意在加强这里的守备力量。兵部侍郎刘源清被任命为总制，都督郤永为总兵。十月，大同总兵李瑾建议在城外挖一道四十里长的濠沟，用来防备外族的骚扰。刘源清赞同此议，限定三日完工。李瑾平素就十分严厉，此时为赶工期便对士卒不断严刑催促，士卒不堪忍受，终于又激起了兵变。哗变士卒杀死了李瑾，围住了巡抚潘倬的府第。刘源清又派人搜捕乱党，而在被捕者的名单中大都为有功之士。各镇士卒抗拒捕快随意抓人，双方冲突日益。刘源清率军来到城下，大肆杀掠，郤永也带领军队来到城下。五堡遗属见状尽数哗变，他们关闭城门，拒城自卫，与官军对峙。潘倬、孙允中看到无法控制局面，遂上书皇帝军官妄杀无辜激起兵变的实情。刘源清也上疏称巡抚潘倬姑息逆党，致使镇卒与王师对抗。潘倬逆被罢官。

十一月，任命江桓为总兵，参政樊继祖为大同巡抚。刘源清则一再上疏，“宗室，诸文武都已从贼，实天欲弃此城矣。”朝廷下旨命他攻城。刘源清一面攻城，一面命人决水灌城。哗变军兵拒城顽强抵抗，官军攻城没有获得结果，双方相持不下。其间，叛卒与外族取得了联系，鞑靼骑兵在其首领小王子的率领下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正月大举进犯。平定大同叛兵的官军不得不分兵抵御小王子的入侵，郤永率军迎击鞑靼兵，结果作战失利，鞑靼骑兵在边关一带大肆劫掠数月后退去。

朝廷罢免刘源清，任命户部侍郎张瓚代刘源清为总制。张瓚来到军中下令不得攻城，派主事楚书来到城下。城中叛兵表白说，“吾辈非杀将者，畏死自全耳！”楚书进入城中，声言“用兵非朝廷意”，众人皆呼万岁。楚书与哗变军兵达成协议，斩倡乱者，迎官军入城。当夜杀黄镇等24名首犯。巡抚樊继祖也进入城中，安抚人心。

朝中得知兵变已经平息，降旨核查兵变的原因及过程。论定功过，不久，刘源清、郤永被捕入狱，被削籍降职。潘倬、孙允中恢复其原职。张瓚、樊继祖等有功者均有封赏。

三十九、明代七子复古主张

前、后七子是明代中期形成的两个文人集团，他们在文学领域里先后掀起了一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的诗文复古运动。由弘治到万历，统治文坛达一个世纪左右。

前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康海、徐祯卿、边贡、王廷相、王九思等。它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主要活动范围在于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的诗文复古主张，是由李梦阳首先提出来的。李梦阳，字献吉，号定同，甘肃庆阳人，弘治七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因上疏弹劾宦官刘瑾被下狱。刘瑾被诛，又被授江西提学副使。其气节名震一时。“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著有《空同集》六十六卷。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河南信阳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官至陕西提学副使。与李梦阳诗文相交，起初两人十分友善，后因见解歧异而互相诋诃。有《何大复集》三十八卷。为人处事“老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土风。”

· 史 ·

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者老弗道。”李梦阳的代表性言论有:诗歌以盛唐为归,“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诗至杜甫达于高峰,“作诗必须学杜,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如规,至方不能加矩”。而唐以后的宋诗“主理作理语”,更是破坏了诗歌的艺术特征,他认为“诗者,感物造端者也”。“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有感于外物还须达到心物相“契”,即所谓“心会相契,神契则音”,“随寓而发”。要使诗歌达到“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的艺术效果,还必须通过“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的比兴、形象化的表现方法。关于文,则认为文至“西京之后,作者勿论矣。”李梦阳最推重《战国策》的实录精神和优美文采,“录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证其变,攻文者模其辞,好谋者袭其智。”勘为后世之榜样。李梦阳还推重贾谊之文,认为“谊文最高古。”何景明的诗文主张基本上与李梦阳一致。但其见解也有不同之处,二人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李以文坛盟主自居,要求何氏舍己从人,制止其“入室操戈”,以巩固自己在文坛的统治地位。李梦阳先有《赠景明书》,论述景明诗弊,劝其改进。不料何景明竟写《与李空同论诗书》与之相抗衡。其后双方又反复诘难,至景明不能答辩才罢休。(何先李十年而卒)。

李梦阳、何景明在复古这一根本主张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复古上。李梦阳偏重于摹拟古人行迹,“刻意古范”,即学古太似。而何景明则提倡复中有变,也就是要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应该自“成一家之言”,“自创一堂室,自开一户牖”,即学古不似。另一分歧是李重诗文格调、形式的摹拟,“铸形宿模(模),而独守尺寸。”而何则强调内在神情之摹,注重内容的重要性。主张声色为末,质实是本,不能离本就末。与此相关的,李强调字字句句以古为法,尺尺寸寸以古为则,而何则认为“法同则语不必同。”如此等等,比较而言,何在复古中有创新的进步意义,比李梦阳有较少的保守性。

李何所倡导的第一次诗文复古运动,对冲垮台阁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这种惟古是尚的主张和句窃字摹的恶劣文风引起人们强烈的不满和抨击,其复古运动也就渐渐地平熄了。正当此时,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领袖的后七子运动步其前履紧随其人,通过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前七子的主张而登上了文坛。

后七子活动年代约晚于前七子40年。后七子主将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嘉靖甲辰进士,授刑部主事。出为顺德知府,后擢升为河南按察使。著有《沧溟集》三十卷。另一主将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称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丁未进士,授刑部主事,出为山东副使。以父忬被杀解官,复起累,官至刑部尚书。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王世贞与李攀龙共主盟文坛,时称王、李。李攀龙死后,王世贞独主文坛20年。前后七子中,王世贞学问最为渊博,影响最大,他才高,位显,“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心流,莫不奔走进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而这一运动的中坚力点则是七子中的另外几位文人,即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

后七子的诗文复古主张与前七子大致相同,他们都是“是古非今”论者。倡导诗之格调、法度,以汉魏盛唐为第一义。李攀龙“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他的诗尽以摹拟为能事。为文则“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王世贞持论与李攀龙完全相同。他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还书勿读。”认为诗文都是愈古愈好。他自己的诗文连篇累牍,无不模拟。后七子中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谢榛,字茂秦,山东临清人,终身布衣。著有《四溟诗话》,后七子中他年龄最长,是七子结社初期的盟主。后来李攀龙声望渐盛,他因与李攀龙论诗不合而终致割席绝交。实际上,后七子论诗的纲领性意见是谢榛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反对盲目地拟古,而主张汲取盛唐十

· 史 ·

五七九

四家的创作经验来作自己的诗。有些近于何景明的观点,提倡模拟中应有变化。前后七子其他成员论点也是大同小异。

前后七子掀起的诗文复古运动,雄踞文坛长达一个世纪左右。他们不单纯是前后各七个人,其实围绕他们在当时形成了两个相当可观的文人集团。他们的影响很大,其复古思潮曾激起巨大的波澜,当时“学者翕然从之”,“推尊之者遍天下”。文体为之一变。应该说他们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对廓清“台阁体”的影响,纠正“萎弱”的文风方面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但他们的复古模拟和形式主义的主张,却给诗文创作带来普遍衰退的严重后果,这是前七子所始料不及的。到了后七子王世贞的晚年才对自己倡导复古所产生的弊病有所察觉。当时,复古派的反对者已应运而生,一如一度“推尊之者遍天下”一样,“攻之者亦遍天下。”直到“公安派”三袁高举起反复古大旗,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才彻底瓦解。

四十、吴门画派的创立

明初,属于宫廷绘画的“院体”在美术界居于主导地位,但从成化到嘉靖前后,院画势力开始衰微。其时,苏州一带经济繁荣,各种工商业发展很快,这直接推动了文化艺术走向兴盛;苏州逐渐成为了四方文人聚集之地,而吴门画派也因此应运而生。

吴门画派继承元季四大家画风,属文人画体系。创始人沈周,长州(今苏州)人,世代隐居吴门。沈周一生居家读书,但未应科举,善于绘画兼工山水、花鸟与人物。所作山水画多描绘南方山水及园林景观,反映文人生活的闲雅意趣,画法上承董源、巨然及元季四家的风格,又参以南宋及明初诸家笔墨,融会贯通,刚柔并用,形成了粗笔水墨的新风格。早年多以小幅为主,四十岁后始拓为大幅,全面发展了文人水墨写意的画法。成化三年(1467年),绘《仿董巨山水图》轴,在狭长的尺幅中,作长林巨壑之景,布局丰满,另有《东庄图》、《盆菊幽赏图》、《牡丹图》等,皆为精心之作。

拜师沈周而成为吴门派大家的有文征明。文征明,长洲人,出身仕宦,屡试未中,年长后才由诸生推荐为翰林待诏,居官四年辞归,徘徊啸咏其间。与祝允明、唐寅、徐祝卿天游玩,时称“吴中四才子”。文征明绘画造诣全面,山水、人物、花卉、兰竹皆精。一生穷究画理,尽心实践,声名远著,是继沈周之后的吴门画派领袖。文征明传世山水画精品有早年所绘《雨余春树图》、《烟江叠嶂图》、《寄傲图》等,中年精品更多,如《木榭煎茶图》、《惠山茶会图》等。晚年兼能粗细笔法,笔墨愈趋苍秀,《江南春图》为细笔杰作之一,粗笔一路则有《溪桥策杖图》等。他还精于人物画作与花卉图。

唐寅,吴县(今苏州市)人,少有才名,弘治年间中应天府(南京)解元,后入京会试,因考场舞弊案的牵连下狱,罢为吏。故此不再过问作官之途,筑室桃花坞,以诗文书画终其生。唐寅早年从师周臣,又追慕李唐、刘松年、马远,喜爱“院体”传统,吸收元四家“文人画”之水墨浅绛法,杂取众长,自创一体,在吴门画派中独树一帜。他的山水画多表现为雄奇峻伟之重山复岭,及至楼阁溪桥,亭榭园林,表现了文人幽士的闲逸生活。山水画有《骑驴归思图》、《落霞孤鹜图》、《事茗图》等杰作。画中又以人物画居多,多描绘古今仕女生活和历史故事,所绘仕女形象造型优美,着色明快,技法精湛。

· 史 ·

仇英，江苏太仓人，后居苏州。初为漆工，后改而绘画。年轻时因善绘画而结识许多名家，拜周臣门下，为文征明与唐寅等器重，曾在著名鉴藏家项元汴、周云观家中观识了大量古代名作，他善于绘人物、山水、花草等，尤长于临摹。临摹以仿唐宋名家稿本居多，其中有著名的《中兴瑞应图》传世，仿南宋萧照。仇英绘画虽受“院体”影响甚重，但含蓄蕴藉，色彩淡雅，仍具文人画的笔致墨韵。如《连溪渔隐图》等清疏淡雅，画法工细，得赵孟頫之墨韵。仇英《人物山水册》，是人物仕女画工笔重色的代表作，对清代宫廷画有较大影响。

吴门画派自兴起之后，继起者多与文征明有渊源。文征明的子侄、学生成为知名画家的便有其子文彭、文嘉，其侄文伯仁，学生钱谷、陆治、陆师道、陈道复、居节、朱朗等，一时人才济济，实力雄厚的吴门画派，传播甚广。明后期，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华亭派崛起，稍晚的程嘉遂、李流芳、卞文瑜、邵弥等以“画中九友”著称，他们也同属吴门画派的文人画体系。

董其昌，华亭（松江）人。专长于画山水，出入于董源、巨然、高克恭、黄公望、倪瓒，融合变化，尤致力于黄、倪。虽然他十分注重效法古人传统技法，题材也缺少变化，但非常注意笔墨的独特造诣，故画风能脱出巢袭，自成一体。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又直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所绘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多灵变，墨色干湿浓淡，层次分明，蕴蓄丰厚。董其昌又在绘画理论上倡导“文人画”的“士气”，主张书画相遵，笔墨上追求“生”、“拙”、“真”、“淡”的趣味和效果。为标榜文人画而提出著名的“南北宗”之说，推举文人画的南宗而贬低行家画的北宗，对后代绘画理论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十一、心学的创立

明代初期，明太祖下令用朱熹的《回书集注》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明成祖朱棣命令胡广编纂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以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可见，对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被皇帝推到了重要地位，并作为统治思想而大力提倡。到明代中叶，程朱理学在思想界的支配地位，开始发生动摇，王守仁所提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致良知”学说代之而起。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年），受宦官刘瑾排挤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正德十一年（1516年），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前往镇压江西、福建等地的农民起义，参与过平定江西宁王宸濠的叛乱，深得明廷重用，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是当时官僚地主阶级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及言论，由其门人编为《王文成公全书》，又称《阳明全书》，共三十八卷。

王守仁的学说，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他反对程朱理学，反对客观唯心主义。他发展了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并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后人合称他俩人的思想为“陆王学派”。又因王守仁曾在自己的故乡阳明洞筑室讲学，大肆宣扬自己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后人称他为阳明先生，其思想称为“阳明学派”。他是宋元以来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

者。他认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即心这个本体是无所不包的。他进而指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把一切客观事物都看做是主观精神的体现。离开主观精神的任何客观事物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心学”的实质，集中体现在他的“致良知”的说教中。他说：“良知者，心之本体”，是天赋的，固有的”。他认为，“良知”就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但人们往往因私欲障碍，蒙蔽了良知，以致“人欲肆，而天理亡”，所以他宣扬“去得人欲，便识天理”，只要将私欲一齐去尽，便能归复良知之本体。但王守仁所说的“良知”或“天理”，就是封建的伦理道德。王守仁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心所固有的，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强加给人民群众的，所以人民群众就应该自觉自愿去遵守封建统治秩序，老老实实地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奴役。这就是王守仁学说的核心要义，也是他的学说的最终目的所在。王守仁在主张用武力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到处发布告，进行封建主义的德化教育和守法教育。还随处讲学，培训维护封建统治的人材。

王守仁反程朱理学，具有解脱传统束缚的精神。对晚明以至明清之际的思想发展，有一定的积极影响。随着王守仁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它逐渐地分化为对立的两派，右派因袭王学的保守传统，左派则发展了王学中积极的因素。王学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王艮和李贽。

四十二、明世宗崇道教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朝的第12位皇帝。他极端信奉道教，特别想长生不死。即位后整天在宫内打醮设斋、炼汞化铅，在宫外搜罗红玉、黄玉用来祀神，还四处招徕道士寻访符篆秘方。

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刚刚即位便开始兴建寺观。继而崇道的活动接连不断，嘉靖皇帝几乎整年不上朝理政，全身心地投入道教之中。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发生了“宫变事件”。以宫女杨金英为首的十几名宫女乘明世宗熟睡之际，用绳索将他的脖子勒住，决心勒死这个荒淫好色的皇帝。因为宫女们在慌乱之中没有把绳索打成死结，又立即被人发现，世宗幸免一死，而十几名宫女全部处死。事后他说：“朕非赖天地鸿恩，遏除宫变，焉有今兹。”从此搬出皇宫，移居西内，整日求取长生之术，对道教更加深信不疑。

明世宗在位期间，对道士和所谓“高人”非常宠爱。因此在他周围陆续聚集了一批道士，这些人投其所好，将世宗哄得心醉神迷，一心要当神仙。当然世宗对他们也加官进爵、巨额封赏。

早在嘉靖三年(1524年)，世宗把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邵元节请进北京。邵元节曾经跟范文泰学过《龙图龟范》，据说会祈雨雪。此人年纪虽大，但是童颜鹤发，颇有些仙风道骨。世宗对他十分信任，封他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虔诚致一真人”，赐给他玉带冠服和玉、金、银象印各一枚。还在城西修建一座真人府，每年给俸禄一百石，派遣四十人充当仆役。嘉靖十五年(1536年)，世宗有了儿子，这被认为是邵元节祷祀显灵的结果，他被加授礼部尚书，官封一品，赐给白金、文绮、宝冠、法服、貂裘等物。嘉靖十八

· 史 ·

年(1539年),邵元节死,明世宗悲痛万分,手诏为邵元节举行葬礼,恤典按伯爵的等级。同年,封方士陶仲文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陶仲文在万玉山学过符水诀,会“符水咒剑”的驱妖法。一次,在皇帝周围突然有一阵旋风刮来,陶仲文解释说将有火灾。当夜果然在皇帝居住的行宫中失火。陶仲文由此更得信任。嘉靖十九年(1540年),进封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主管道教事务,以后又兼任少保、少傅、少师、礼部尚书,食一品俸,地位赫然居于群臣之上。难怪当时的群臣感叹地说,以一人兼领三孤,在明朝独一无二。顾可学本来是一个因贪污公款而被罢官的小官僚。他不知从哪里学来了一套道教法术,便自称可以“炼童男女洩为秋石,服之延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顾可学被世宗赐以金银,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太保。

明世宗身边的道士形形色色,无所不有。其中大都只会一两种骗术,用以取悦于皇帝,而他们的结局也并非全如邵元节、陶仲文等人那样幸运。一旦所谓“法术”失灵或者败露,往往就会大祸临头。

很多大臣对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不理国政十分不满,纷纷上疏劝谏。嘉靖二年(1523年),大学士杨廷和在疏条奏“慎始修德十二事”时,就把“斋醮祈祷”列为第一条,认为“必须统绝其端,不可轻信。”九卿乔宇上疏中也说“信用妖幻”、“建立坛场”是“不可之大者。”明世宗在他执政时期的头十年还稍有收敛,从嘉靖十年(1531年)之后便有些瘾头大发、走火入魔了。嘉靖十七年(1538年),给事中黄臣劝谏世宗勿用方士,世宗对此置之不理;嘉靖十八年(1539年),太仆卿杨最劝谏勿用道士方术,说丹药伤元气,应该“恭默思道,不迓声色”,结果被捉到镇抚司处死。

明世宗晚年,对道教的信奉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一些做法十分荒唐可笑。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之后,明世宗长住西苑,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上朝理政。同时大兴土木,兴建了许多斋官秘殿。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又招来了自称能合丹药的王金等人。此时恰逢世宗生病,王金等道士将所炼的金石丹药一起进献。世宗服后浑身如火烧般焦燥,病情日益加重,在从西苑搬回乾清宫的当天就死了。

明世宗在位45年,道教在盛极了45年后也走向了衰退。

四十三、征剿河套

河套东西北三面临黄河,南面临长城,周围数千里,土地肥沃,易于农耕。英宗时蒙古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部人居河套。由于各部常因争夺水草之地发生矛盾,因此,尚未对明廷构成威胁。

成化元年(1465年),毛里孩侵略陕西,在都御史项忠等抗击下而逃走。不久,又侵扰大同。这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成化二年(1466年),兵部郎中杨瑄,提出迁移边境堡垒,增强防御功能的建议。大学士李贤等上疏,要求“进兵搜剿,务在尽绝”,以安边境。宪宗采纳李贤的奏议,命陕西巡抚项忠、太监裴当、总兵杨信,征剿河套,但查无结果。成化六年(1470年)令都御史王越“总关中军务,议搜河套,复东胜”。王越建议任命“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统制诸军,往图大举。”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命武定侯赵辅为总兵官,“总制各路军马,搜河套。”几次出师征剿,毫无成效。赵辅因病,无功而还。成化九年(1473

· 史 ·

五八三

年),李罗忽等部侵犯韦州。王越得知其老弱尽行,位比在红盐池,便与总兵许宁、游击周玉等率轻骑,夜驰三百余里,斩杀数百人,获畜产、器械甚众,尽烧庐帐而还。李罗忽等部失掉了其妻子儿女,“相与悲泣,渡河而去。”祸患由此稍微减少。

孝宗时,火筛率部又入河套住牧。大臣从长远考虑,再次议论收复河套。孝宗驾崩后,刘瑾专朝政,主张收复河套的总制三边杨一清被罢职,大臣从此不敢再说河套事,因此,进住河套的鞑靼势力日益壮大起来。

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河套游骑二万,自井儿堡入侵固原等地,杀指挥杨洪、千户刘瑞。这时鞑靼几万人的部落已经有数个了,其中以小王子子孙为最强。他们经常侵扰边塞,“杀伤以万计”,使边塞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大臣们再次纷纷上疏,要求征剿河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巡按山西御史陈豪,重提收复河套,他认为鞑靼内侵,“不由诸隘口,皆狼攀绝壁,蚁附悬崖,边垣又何足恃?”他反靠修建城堡或屯守对付入侵,建议“廷臣集议万全之策,期于必战,尽复套地。”世宗仍未采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八月,河套骑三万余入侵延安府,至三原、泾阳,杀掠人畜无数。总督三边侍郎曾铣上疏,提出收复河套的“八议”万余言。十二月,曾铣两次上疏,称“套贼不除,中国之祸未可量也。”世宗对曾铣的建议非常赞赏,他说:“寇据河套,为中国患久矣。连岁关隘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边臣无分主忧者。今铣能倡复套之谋,甚见壮猷。”由于鞑靼入侵次数越来越频繁,虏掠范围越来越大,加之大臣们一再要求征剿,世宗迫于内外压力,终于同意对河套进行征剿。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曾铣率军攻入河套,选锐卒出击,鞑靼“毙于矢石者甚众”。获马牛羊、器械若干,俘脱脱虎一人,斩首26人。鞑靼余部移帐北去。曾铣率众追击,鞑靼于是远逃,不敢接近边塞。小胜后,曾铣会同陕西巡抚谢蓝、延绥巡抚扬守谦、宁夏巡抚王邦瑞等,讨论收复河套的方略,提出恢复河套、修筑边墙、选择将材、选练士卒等十八条,并上营阵八图。世宗交兵部讨论。兵部尚书王以旗与大臣们讨论后,认为:“曾铣先后章疏,俱可施行。”

第二年,严嵩把灾害的出现归罪于主张收复河套的大臣们。他说:“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当罪。”夏言是大学士,和曾铣一样,力主收复河套。世宗听信严嵩的谎言,罢了夏言的官,并把曾铣逮捕至京师,贬兵部尚书王以旗总督军务。大臣凡主张收复河套者,一律罢官,并罚以廷杖。正遇俺答侵扰延、宁,严嵩进一步诬陷说:“皆曾铣开边启衅所致。”兵部侍郎万镇落井下石,攻击曾铣“罔上贪功”。甘肃总兵仇鸾曾被曾铣劾奏,逮京罢官,他公报私仇,也上疏攻击曾铣。世宗不辨奸良,在严嵩主持下,将曾铣弃市。接着宣府受到侵袭。世宗说:“寇以言、铣收河套,故报复至此。”于是又把夏言杀害。曾铣、夏言死后,再无人敢议论收复河套事。

四十四、蒙古南犯

蒙古在正统年间南侵明朝之后,其内部不久即发生了争斗,开始走向衰落,与此相反东蒙古鞑靼部开始崛起。到明弘治初年,鞑靼部的汗王达延汗以武力统一了蒙古各部,将其子阿著封于河套。阿著有两个儿子,一名吉囊,一名俺答。吉囊的分地在河套、关中

· 史 ·

一带,地方富饶;俺答的分地在开原、上都一带(为后来的内蒙古),地贫,因而俺答惯于掠劫。后来俺答强盛起来,拥兵十多万,在蒙古诸部中势力最为强大。嘉靖八年(1529年)十一月,吉囊、俺答入侵榆林(陕西今县)、宁夏塞,总督王琼率兵把击退他们。王琼为此请求明廷批准明廷修筑边墙(长城),从兰(今甘肃兰州)、洮(今甘肃临洮)起到榆林,长三千多里。当月,俺答又入侵大同。嘉靖九年(1530年),俺答又入侵宁夏,并时常侵掠边境。七月,入侵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嘉靖十年(1531年)四月,俺答又侵大同,十月,入侵陕西,十一月侵大同,还侵扰西川。从那时起,每年都要入侵内地,杀人掠物,不可胜数。

嘉靖十九年(1540年)八月,俺答所统诸部大举入侵宣府,一路破关占地,杀人如麻。年底,俺答又入侵大同。

嘉靖二十一年(1541年)十月,吉囊又入大同塞,深入到太原,并从太原南犯,杀人、掠畜数万,朝廷大为震动,京城宣告戒严。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七月,俺答再入大同、太原,一直向南。此次入侵,俺答杀人二十多万,杀牛马羊猪等牲畜200万口,还焚毁了大量房屋、田地。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月,俺答又入大同,被总督翟鹏击退。十一月,俺答攻破宣府,入紫荆关,朝廷将总督翟鹏、巡抚朱方下狱追究责任。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俺答又大举入侵,攻掠大同,到达怀来,明将江瀚、董阳战死,总兵周尚文率兵一万击退蒙古兵。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七月,俺答侵犯大同境内,大同总兵张达、副总兵林椿均阵亡,被俺答割去人头。九月,俺答东犯,攻入蓟州。当时严嵩当权,明将仇鸾因向严嵩之子严世蕃行贿,被任命为宣大总兵,他在俺答将入侵大同时,派人向俺答送上重赂,请求不侵大同,去侵其他地方,以至俺答东侵,犯蓟州。兵部尚书丁汝夔不向明世宗奏报,仅命令蓟州守将严防,等待警报渐急,才发京营兵24000、调边兵12000防守诸关。失败。九月,俺答攻古北口,被都御史王汝孝击走。后俺答又用计夹击明军,明京兵大败。俺答随后大掠怀柔、顺义,进入京畿。巡按顺天御史王忬闻报,逢知兵弱无力抵抗,连夜起草奏章,认为俺答入侵威胁京师,请皇帝速议对策。王忬随即前往通州驻扎。布置防务。夜半,蒙古兵到达,王忬求援,京师震动。宣大总兵仇鸾以二万兵入援,与副总兵徐珏、游击张腾等率兵阵通州河西,京城紧急布防。俺答兵自白河东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民,焚毁房舍,难民纷纷逃入京城。俺答一直攻到东直门,掠去内侍八名,后放回,带回俺答书信,求入贡。夜间,俺答又在德胜、安定两门外烧杀。

俺答又犯明陵、巩华城,掠西山,良乡以西,保定震动。

俺答又引兵西掠,前后所获人口、牲畜、财物无数,满载而去。明朝兵有十余万人,,在俺答近走时,不敢拦击。仇鸾在昌平以北遇到俺答兵,被杀伤一千多人。随后从古北口逃走。

嘉靖三十年(1551年)四月,明朝与俺答互通马市,但年底俺答又入侵大同,原因是俺答多索马价未遂,立即大怒,侵大同,掠宣府。从此间市间侵,变化无常。由于边防营堡损坏,戍兵尽撤,俺答兵得以长驱直入。这时兵部尚书赵锦主张备战,明世宗采纳此议,命总督侦查、防御。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二月,俺答又侵扰大同,御史李逢时建策讨伐和练兵,不再隐忍。明世宗也认为应专心备战守。三月,俺答再次侵扰大同,直抵怀仁大掠,得利后逃走。八月,俺答入侵蓟州,这时佩大将军印的仇鸾病死,其党害怕罪过企图叛逃,不得遏

· 史 ·

后,被处斩朝廷还追究仇鸾罪行,剖棺戮尸,布告天下。俺答闻知仇鸾事败,自行退走。此后,俺答每年都向大同入侵。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俺答由墙子岭直犯通州,北京震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又犯大同、宣府。

隆庆元年(1567年)六月,俺答再犯大同,被参将刘国击退。次年,明廷整修边备。

隆庆四年(1570年)十一月,俺答之孙把汉那吉率其部属阿力哥军十人投降。总督王崇古纳降,明穆宗则言:他们慕义来归降,应该优加安抚。并封把汉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还给赏赐。这使俺答既感动又愧悔,表示要世代归服明朝。年底,俺答为表示效忠明朝,还抓送叛人赵全等九人于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

神宗万历年间,与俺答子宾兔开河西互市,又应俺答要求开洮州等茶市。万历九年(1581年),俺答死。万历十一年(1583年),子黄台吉袭封为顺义王。万历十四年(1586年),黄台吉死。次年,封其子扯力克为顺义王。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扯力克死,孙卜失兔袭封。此时其部落多已散失,力量削弱,对明朝的威胁也已不复存在。

四十五、《永乐大典》的编纂

明朝不仅设立各类文化教育机构,而且选拔和培养人才,重视古籍图书的编纂和整理工作,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大学士解缙在南京编纂《永乐大典》。朱棣诏谕:“天下古今事物,散在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把编纂大型类书的目的和方法作了明确交待,并对编纂的范围作出要求,“自有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集为一书,毋厌浩繁。”

解缙等召集147人,匆匆编纂,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初稿完成,定名《文献大成》呈上。朱棣阅后,不甚满意,说“所进书,尚多未备”,过于简单,采摘不广,遂命重修。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侍读解缙等人主持重修。

《永乐大典》编纂时组织机构严密、分工精细。最高负责人是监修,由姚广孝、郑赐、解缙担任。以下是副监修,由刑部侍郎刘季篪、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刚,翰林院修撰兼右春坊右赞善梁潜担任。监修以下设都总裁、总裁、副总裁,其次为纂修、编写人、缮录及圈点生等。层层负责,分工细致,纂修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永乐大典》的编纂,全书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将我国自古以来所有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地抄入。当时辑入的图书达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医药、志乘等门类。经过三年的紧张编纂,到永乐五年十一月完成。朱棣御定书名为《永乐大典》,并亲写序文。序文说,该书编纂“始于元年之秋,而成于五年之冬,总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其中目录为六十卷)。朱棣赞扬《永乐大典》“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著为奥典”。《永乐大典》成书后,分别装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余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中华民族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 史 ·

《永乐大典》是在南京文渊阁修纂的,修成后就藏于此阁的东阁里,因卷帙浩繁,只有原本,不曾刊印。明成祖很重视很喜欢这套类书,迁都北京后,命令将《永乐大典》从南京移藏于北京紫禁城的体仁阁。而在他的御案上,经常放置几函《永乐大典》,以备随时查阅。明孝宗和明世宗也是最喜欢读书尤其喜欢《永乐大典》的两个皇帝。明孝宗曾经把《永乐大典》中的医药秘方抄赐给太医院。明世宗的案头常置数函,根据自己所需,按韵索览,拟囊中取物之便。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十三日,北京紫禁城内一场大火,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文武二殿、奉天门、左顺门、右顺门、午门及午门外直庐俱焚毁。火灾的当夜,为了保护、抢救藏在宫中的《永乐大典》,明世宗一连下了几道命令,意即不惜一切代价抱出《大典》。这样,《永乐大典》才在此次火灾中幸免于难。为了防止不测之虞,明世宗很想重录一部,此打算曾几次同建极殿大学士徐阶谈过。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三日,正式决定重录,命礼部左侍郎高拱、翰林院编修张居正主持。命右奉坊右谕德兼侍读瞿景淳为总校官,翰林院修撰林燦、丁士美、徐时行、翰林院编修吕旻、王希烈、张四维、陶大临、检讨吴可行,马自强等担任分校官。为了使重录《永乐大典》字迹清楚漂亮,吏部和礼部主持了“湖名考试”,招收善书之人,结果录取程道南等儒生 109 人,负责誊清缮写工作。

于隆庆元年(1627年)四月完成。《四库全书总目》说:“选礼部儒生程道南等一百人,重录正副二本。”原本归南京保存,正副本藏于北京。可能正本藏于文渊阁,后来肯定副本,藏于皇史宬。后来,南京原本尽毁,北京的正本毁于明亡之际,副本于清末被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两次焚烧和劫掠,所剩无几。据载,现存于世界上十几个国家的三十几个公私收藏家手中的《永乐大典》,约三百七十余册,共八百余卷。

四十六、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李时珍生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字东璧,号濒湖,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政府礼部通知各地推荐医学人才,以入太医院补缺。李时珍因学识渊博,被湖广的官吏荐举到北京皇家的太医院工作。李时珍在北京不到一年,就托病辞职,回到蕲州。李时珍回到家乡,一边行医,一边坚持对《本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采访。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从汉朝到宋代,研究本草的著作达四十种以上,但都存在许多缺点,如药物不全,分类不科学,解释错误,他立志写一部新的科学而又全面的药物学著作。为此,他“穷搜博采,芟烦补缺,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他还不辞劳苦,实地考察采访,到湖广一带的深山峡谷,进行医药调查采药,采集标本,潜心研究,弄清每种药物的名称、产地、形状、气味、功能、栽培方法以及生长情况。把诸家《本草》重复者删除,疑误者辨正,采取精华,三易其稿,终于在万历六年(1578年)著成一部药物学的伟大巨著《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共五十二卷,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十六部。每部又分若干类,共计六十类。每一类再列出各种药物。全书共收药物 1892,附药方 11096 个,附图 1160 幅。共计 190 万字。每种药物解释详尽,首先标出药物名称,叫做“纲”,其余各栏的解释叫做“目”,“物以类从,目随纲举”,所以书名定为《本

· 史 · ----- 五八七 -----

草纲目》。纲目分明,体例先进,方便索检。“目”的其他栏内有:“释名”,解释药物名称来由之根据;“集解”,说明药物产地,形态和采集方法;“修治”,说明炮制的方法;“发明”,记述前人及李时珍本人对药物的临床经验;“性味”,分析药物的性质和气味;“主治”,说明药物的功效。另外,有的药物设有“正误”栏目,以便纠正前人对该药物的错误认识。每种药物之后,附怎样使用的处方。

《本草纲目》把十六世纪以前的中国药物学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并且把药物学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它是一部伟大的科学巨著,是我国医药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为中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所以它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本草纲目》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刊布于全国以来,广为流传,辗转翻刻达数十次。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首先传入日本、朝鲜,以后陆续流传到亚洲、欧洲、美洲、非洲、澳洲等五大洲,成为世界科技史上重要的著作之一,对国内外的医药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把中国药物分为十六部,六十类,对药物的生产、形状、气味、主治、体用都作了精确的分析和详细的记载,从而形成中国药物学和中国植物学自身的科学体系。另外,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新增加药物达374种,这是他苦心调研发现的成果,是他对中国药物学的新贡献。在该书里,他提出“脑为元神之府”,在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人脑是全身主宰。

四十七、努尔哈赤称汗

努尔哈赤(1559~1626),姓爱新觉罗,其先祖猛哥帖木耳自明永乐十年(1412)受明册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世代是受明封爵的地方官。原先女真各部一直不和,图伦部的尼堪外兰,勾结胆军,谋害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万历十一年(1583),年仅25岁的努尔哈赤凭其先祖所遗13副盔甲,起兵征讨尼堪外兰,开始了他统一女真各部的征程。努尔哈赤集合残部数百人,征讨尼堪外兰,一举攻克图伦城,获兵百人,盔甲30副。尼堪外兰逃奔鄂勒珲城,明廷遂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努尔哈赤继续东征西讨。次年(1584)九月,攻取董鄂的翁鄂洛城;万历十三年(1585),攻取浑河部的界凡等城;十四年(1586)攻并苏克苏护河部的瓜之佳城、浑河部的贝珲城、哲陈部的托摩和城,继而又进攻尼堪外兰于鄂勒珲城,尼堪外兰逃往抚顺请求明军保护,明军抓住他送给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遂与明讲和,通贡受封。万历十六年(1588),努尔哈赤灭完颜部,至此他正式统一了建州五部,力量迅速壮大。女真人向来熟习弓马,骁勇善战,当时就有“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谚语,努尔哈赤又是自成吉思汗以来难以一见的军事天才,由此开始,他率领的铁骑奔驰于北陲大漠,南疆高原,扩土万里,为清代建立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帝国奠定了基础。

自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势力不断壮大,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开始创立八旗制度。八旗制由牛录制扩充而来。1牛录为300人,首领称“牛录额真”(汉译“佐领”);5牛录为一甲喇,首领称“甲喇额真”(汉译“参领”);5甲喇为一固山,首领称“固山额真”(汉译“都统”)。每一固山有特定颜色之旗帜,当时满州军共有4个固山,分红、黄、蓝、白